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以湖南省 P 村为例

曹庆新¹ 徐晗²¹

(1. 沈阳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42;

2. 沈阳化工大学 人文与艺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42)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 其中提出了“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等要求, 使农村社会工作的开展有明确的角色、广阔的场域和机会来一展专业优势。基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理论, 深度剖析湖南省 P 村社区所存在的问题, 探析社会工作者介入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发现 P 村社区存在以下问题: 文化基础薄弱; 生态环境恶化; 经济发展单一。结合乡村振兴背景, 提出了社会工作者介入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路径, 进一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助力实现党中央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关键词】: 社会工作 乡村振兴 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1 基本情况

P 村属于湖南省某镇, 辖区内有 10 个村, 1 个社区, 总面积 81km², 总人口 2.6 万人。该镇领导班子积极响应中央、省等各级决策部署, 始终坚持脚踏实地、不忘初心的态度, 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 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在这样一种“美好”的大环境下, P 村就属于 10 个行政村之一, 耕地面积 333.33hm², 人口将近 4000 人, 约有 1100 户, 分为 24 个生产组, 其中有 90 户贫困户。P 村主要是一个农业大村, 靠种田和打散工维持生活, 每年到了稻子成熟的季节, 就是当地人最忙碌的时候, 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社区”; 另外, P 村不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 更多的是中年人为主体的, 在家务农, 养家糊口。通过观察发现 P 村村民的房舍基本上都已翻新, 一栋栋新房屹立在马路边, 人们口中“漏风漏雨的破房子”几乎不复存在, 在这里也不会看到或听到有人吃不上饭或者穿不暖。可见, “脱贫”并不是这个农村社区的首要任务, 而如何营造乡村社区共同体, 实现经济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 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才是关键所在。

2 理论支持

作者简介: 曹庆新 (1969-), 男, 辽宁新民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徐晗 (1996-), 女, 湖南岳阳人, 沈阳化工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社会工作。

优势视角强调社区发展应该重视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塞勒伯曾指出，社会工作者的优势视角理论应立足于案主的实践需求，充分发现、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帮助案主实现他们的目标，学会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

基于此，本文将从优势视角角度出发，结合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分析岳阳市 P 村社区的基本情况，了解其所在的问题，进行社区需求分析，挖掘潜在的资源，因地制宜，使当地社区和村民成为农村发展的真正主体。

3 存在的问题

3.1 文化基础薄弱

2017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在徐州考察时，说道“实施乡村振兴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主流思想的涌入使农民思想受到了潜在的冲击，与此同时农业的主导开始丧失，农村社区的结构开始失衡，重建农村社区文化共同体成了建设新时代农村社区的关键一步。

在 P 村不难发现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单一、乏味，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就是“玩牌”，整天带着孩子泡在“牌馆”里面的人不在少数，老年人的生活亦是如此，看不到其他的文化建设活动。2008 年广场舞也曾进入村民的生活中，到了一定的时间，不管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此时就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刻，但后来因为场地和费用问题未得到解决，而不得不草草收场。相关研究发现，在现实中大部分村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驱动力主要为了个人利益，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则表现为漠不关心或等待观望的状态。只愿分享公共资源而不热心建设的现象在农村非常普遍。P 村民风淳朴、好客热情，但是居民的整体思想文化素质不高，唯一的民俗文化就是每年春节的“送戏下乡”，村民烧香拜佛，以传统方式寄托自己新一年的期待和愿望，但“送戏下乡”在文化素质方面对于村民而言难以有较大的提升，难以激发村民对自身文化需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转型期的中国新旧文化碰撞极大，必然对村民带来冲击，影响村民辨别优劣文化的判断力。特别是“三俗文化”的入侵，使农村的婚闹、丧葬和演艺团队等无一不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将新郎绑在树上或电杆子上，用棒子或皮带抽打新郎，甚至扔鸡蛋等；新郎的父母更是穿上奇装异服，脸上涂抹墨水，胸前挂着牌子，被亲朋好友在后面赶着；恶搞新娘，骚扰伴娘等闹剧不断上演。有失风化、触碰道德底线，铺张浪费等类似问题也层出不穷。2010 年 7 月 23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因此村干部要进一步提升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与管理，提高管理队伍素质，克服文化活动单一、质量不高等问题，筹措资金，持之以恒地搞建设。提高基层村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改善农村精神风貌，使乡风文明与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适应。

3.2 生态环境恶化

全面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举措，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若不能实际地解决农村生态环境，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村民的生活幸福感，美丽乡村也难以实现。

P 村内四周有几所大型养猪场，只要经过猪场周围或者天气稍微有点风，村民随时就会闻到难闻的气味；甚至有的村民会把死猪直接套到袋子里扔在水沟或者是任死鱼在湖中发烂发臭，时间一久，腐烂的气味就很难散去，也会污染附近的水质。P 村到处可见黑水沟，要么沟渠里有村民乱扔的垃圾，要么就是农药或者污水排放导致水污染，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饮用水的安全和村容村貌。另外，路灯最近几年才装上，但因为费用问题，路灯时有时无；还有几条次要干道仍然还是过去的泥巴路，一到

下雨天，就寸步难行，据了解因为未解决好其中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而一直耽搁。

目前，某镇 10 个村、1 个社区均建有村级环卫协会、村民理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各类村民自治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相应的作用。尽管村民自治制度早已建立，但其长期以来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有限，制度的出台和推行更多是表象性而不是实质性的，其专业性不强，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未能切实考虑到居民的真实需求。另外，我国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不足，主动参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还远远不够。大多数农民对生态环保的认识局限于“各扫门前雪”。而基层政府对于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培养也远远不够，其手段单一，做法简单。

根据 2018 年 2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农民福祉，事关农村现代化，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样的政策导向和背景下，对包括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工业转嫁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在内的农村突出环境问题进行治疗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因此 P 村的社区治理亟待改善和提高。

3.3 经济活动单一

P 村是一个农业大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农，即使有村民选择外出务工，但也是“初种”时离开，“丰收”时回来，托管给其他村民管理和打理；也会有村民将土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其他村民，在年底拿到相应的费用即可。与此同时，也有村民意识到了仅靠“务农”是难以维持日渐增长的生活需求，所以会努力寻求第二副业。如 P 村很多村民都曾尝试以养殖业作为自己的第二收入来源，例如养鸡场、养猪场、养鱼和龙虾等，但是真正能够走上正轨的却少之又少。不是村民不够勤奋，而是缺少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意识，对市场行情缺少了解，仅靠以往的经验难以有好的成果。某村民曾用自己的鱼塘养基围虾来赚取额外的收入，在天时、地利和人和都具备的情况下，但因为是单打独斗，没有政策和村组织的支持，没有专业技术的指导，所以在有心而无力的情况下，只能无奈的看到小虾越来越少，投入的成本也沉入了“鱼塘”，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受到了打击，无心再谋其他“发财”之道。

另外，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军为七八十年代的中年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思想相对保守固执。相关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收入相对较高，反之。另外，经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的职业农民，学习成果转化率高，易接受新知识新文化，收入较高，甚至是低学历农民的数十倍。由此可见农民劳动收入水平与其所接受的教育，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以及思想的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所以，提升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也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4 解决问题

4.1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文化建设

乡风文明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要。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文化建设，实际上是把社会工作的优势应用到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如工作方式、专业价值、发展观念等，使文化建设工作更具专业化、科学化。P 村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不管男女老少都愿意积极参加大小活动，时常谈起如何如何做，可是在没有人能够主动组织和主导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迈出这一步，而农村社会工作者恰好就充当了这一角色。

4.1.1 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自主性。

开展文化建设，就必须提高农民参与的自主性，不能一直游离在主体和责任之外。首先社会工作者可推动农村社区党组织和单位，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党员表率，干部带头，激发农民自主参与思想政治建设的积极性，在党的引领下，重塑思想政治觉悟，扮演好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角”。补位乡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上的缺位和老化，充分挖掘农民的文

化需求，整合农村社区内的文化资源，发现和引进优秀的乡村文化，剔除封建文化，鼓励农民发挥主体性作用，唤醒农民的文化自觉性。

4.1.2 开展丰富多彩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

像 P 村缺少群众文化活动的村落不在少数，所以社会工作者应结合本土资源，满足农民的主体性需求推进创建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体育活动，按兴趣爱好引导和扶持他们成立各种协会，例如羽毛球协会、健身协会和广场舞协会等。创建具有本村特色的文化品牌项目，开展年评寻找“年度最美家庭”、“年度最美党员”以及“年度最佳返乡创业者”等，并给予相应的荣誉和奖励，以榜样的力量来鼓舞村民积极参与精神文化活动。利用节庆节会活动，开展“健身活动日”、“球类赛事”、“特长展示日”等以及庆新年大联欢活动充分挖掘地方特色，鼓励农民参与，展示自己的热情和激情，使其成为农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开阔基层群众视野，丰富群众基层文化生活，形成一种良好的乡风文明。乡村文化发端于农民，根植于农民，所以农村文化的建设必须贴近于农民，掌握农民切实需求。

4.1.3 着力克服消极文化的影响。

“三俗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工作者应在村干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采用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乡村文化的风向标，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核心，倡导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反对陈旧陋习和封建迷信，减少“三俗文化”的负面影响。社会工作者作为文化建设的推动者，协助村干部加强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根据大众需求，合理规划和制定乡村文化的发展方向，开展主题鲜明的文化教育活动，鼓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觉抵制任何含有“三俗”的文化活动，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科学文明生活，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4.2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生态建设

P 村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是环境的逐步恶化和村民自治组织与群众的联系不紧密，而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关键作用在于协助村民发现问题，探寻问题发生的缘由，组织村民参与问题的讨论，运用专业方法帮助村民去解决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庄形态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

4.2.1 协助推进社区基础性工作。

作为“中介人”，社会工作者组织、鼓励村民主动参与社区中突出的公共问题的解决，加强村内已成立的相关理事会与村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制度，提高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而不是“漠不关心”或“等、靠、要政府来解决”。社会工作者协助村民整合资源、融合社区内多元力量解决社区问题，挖掘社区潜力，补齐社区短板，发挥社区强项，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区治理体系。社会工作者作为基层组织的谏言者，走访社区，充分了解社区内村民的实际需求并反映给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村干部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抓实各项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医疗卫生、文体娱乐、出行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4.2.2 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工作。

针对基层政府对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宣传手段简单，未达到明显的效果，社会工作者可根据所在社区的生态基本情况采用村民易于接受和喜爱的方式宣传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使村民真正地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含义，自觉地保护乡村环境；第一，一方面，运用现代发达的网络平台，如自媒体、微信、抖音等实时地对村内的生态环境进行播报，使村民能够更直观地对居住环境的好坏有所察觉，并欢迎村民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利用更

吸引人的充满趣味性的横幅和漫画式的海报进行宣传，例如“垃圾分类”、“循环经济”等逐步增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重塑生态文化保护观念，使村民对未来美好的居住环境充满遐想和希望。第二，定期举办形式多样化的环保教育活动，如环境教育知识宣讲会、志愿行动等，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其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有效地提升村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感和参与感，从自身做起，点滴助力乡村振兴。第三，督促当地因牺牲环境追求经济效益的乡镇企业，例如养猪场，及时转变观念，实现绿色经营和生产，自觉与当地政府和村民参与“生态环境”战役中，实现多元共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只有把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理念融于乡村振兴战略，及时督促多元主义的“合作共治”，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才有可能得到根本上的扭转，才能实现从“环境换取增长”转变为“环境优化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转变为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

4.2.3 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规范。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安排，因地制宜，结合农村社区生态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管理制度。

按照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思路，针对垃圾乱扔和影响村容村貌的不良行为，作为居民生活的助力者，强化责任追究制度，追究到每家每户每人，一旦发现恶性污染事件，严重者予以法律惩治为主，轻者则以恢复原生态原貌为主，促使村民了解自己与环境的不当互动行为，承担起主人翁的责任。尤其是针对 P 村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逐步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恢复水生态，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长制、湖长制管理，动员村民适时进行监控和管理。引入市场运行机制，研究发现第三方的治理非常重要。这种模式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生态治理，使更多的资金流入到农村，同时也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投资多元化，带动地区经济发展。除此之外，还有利于治理技术流入到农村地区，提高农村生态治理的效果。

4.3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经济发展

很多农村之所以出现“返贫”、“复贫”的情况，是因为“输血式”的扶贫策略没有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动性，他们自身的优势和能力被忽视了。而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与基层政府合作，协助政府推动多元主体，整合城乡、社会资源，为村民带去他们所缺乏的资源，例如技术、经验和资金的支持。并从优势视角出发，充分挖掘村民潜在的资产和能力，实现乡村振兴。

4.3.1 推动政策落实，拉动资金支持。

2020 中央一号文件其中就有聚焦于“优先保障三农投入”，出台和调整了系列政策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给予农村和农民资金支持，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权，例如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按规定享受现行小微企业相关贷款税收减免政策和落实农户小额贷款税收优惠政策等。针对农民对相关政策解读不清的情况，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社会行政方式将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转化为公共服务，普及、宣传和落实政策的执行，提高农民的政策意识和运用能力，帮助其从中获得依法享受的资金支持和优惠补贴，从而减轻发展农业产业和回乡创业的压力和负担。鼓励社会资本对农业农村的投入，链接外部资源，使相关企业能与农业的发展形成对口模式，例如发展绿色产业的资金扶持和稳定产业的专项供应和输送，注重合作共赢，刺激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农民的消费能力。社会资本的投资可以起到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作用，也是此次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危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措施。

4.3.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助力农业科技化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的进步与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高低呈正相关。因此，社会工作者针对 P 村农业发展的现状，应积极搭建农民

学习教育平台，提高农民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为农民感兴趣的第二副业争取相应的培训机会，并为其送上专业书籍进行参考和学习。协助基层政府落实人社部面向农民工开展的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按要求落实农民工免费培训政策、参加培训的贫困劳动力生活补贴和企业以工代训政策，使农民在参加培训的同时无后顾之忧。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链接资源带领农民参观和感受智能设备机械为农业发展带来的便利化，加大推广新型智能农机设备的宣传，为农业的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优化农业发展方式和手段，进一步扩大农作物的产量。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链接相关企业或农业类大学与家庭农场形成对接模式，家庭农场为企业和高校提供试验田地和实践场地，企业和高校为家庭农场提供最新农作物培育技术、提供智能农机设备和帮助家庭农场科学地种植农作物等形成“双赢”的合作模式。

4.3.3 优化管理，发展特色产业。

产业兴，则乡村兴。针对 P 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工作者可进行相关调研和访谈，将有想法在本地发展第二副业和已经在本地将第二副业发展起来的村民组织起来，协助成立农民协会和各种产业协会，进行商讨和交流，分享经验，避免盲区。并从中培育优质的产业协会向专业性组织发展，联系专家给予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指导，逐渐升级为具有完整体系结构的产业链，促进本土乡村经济的发展，带动更多想拓宽增收渠道的农民开垦另一片天地，实现真正的“先富带后富”。社会工作者作为协会或组织的“发起人”，在已有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协助农民找准产业定位，充分发现和利用乡村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特别是国家重点支持的物流配送和农村电商体系，同时也可实现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加农村社区的活力，减缓农村老龄化的趋势。作为农民的“发言人”，积极听取农民意见，及时将农民在就业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反馈给当地政府，为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实现农民增收、创收。

5 结语

广袤的中国农村是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场域，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服务和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使二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湖南省 P 村是中国“乡村振兴”的主体之一，也有着大多数农村社区的生态域情的复杂性，在行政化组织不能满足村民的切实需要时，农村社会工作者就在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了“政策输送者”、“资源链接者”、“直接服务者”和“参与引导者”等角色，通过提供精准、精细的服务，回应困难群众急切的需要，帮助农村社区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对乡村共同体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张和清, 杨锡聪, 古学斌. 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J]. 社会学研究, 2008(6):174-193.
- [2]刘海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创新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方式：社会工作介入——以粤西 Q 村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7):292-294.
- [3]陈星, 陈毅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J]. 大众文艺, 2020(5):248-249.
- [4]宋希霖. 农民文化素质提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J]. 南方农业, 2016(18):194-195.
- [5]朱炯炯. 生态文明建设攻坚期农村生态治理的意义及措施[J]. 吉林农业, 2019(23):22+38.